



卡斯特罗言论集

卡斯特罗言论集

第一册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卡斯特罗言论集

第一册

*

人民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4 · 插页 5 · 字数 311,000

1963年4月第1版

196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901·722 定价 (五) 2.20 元

出版者說明

本书收集了古巴革命領袖菲德尔·卡斯特罗同志一九五三年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以及从一九五九年二月起到一九六三年一月期間的讲演和論文，共二十六篇，分成两册出版。各篇排列以发表時間先后为序，其中已出过中文单行本的，在收入本书时曾根据原文对譯文作了某些修改。

一九六三年四月

目 录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在古巴 圣地亚哥紧急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詞）	1
就任总理职务时的演說（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六日）	82
在古巴工人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105
在第一届拉丁美洲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〇年八月六日）	145
在第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說（一九六〇年九月 二十六日）	178
在《新聞对答》电视特別节目里的讲话 （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五日）	236
在古巴五个产业工会大会上的演說（一九六〇年 十一月八日）	310
在庆祝古巴革命胜利两周年群众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	339
在拉丁美洲种植园工人第一次代表會議上的 演說（一九六一年三月六日）	361
在紀念攻打总统府四周年大会上的演說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	411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在古巴圣地亚哥
紧急法庭上的自我辩护词)

古巴国家印刷局序：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是我国人民革命史上一个伟大的日子。那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设立于古巴的圣地亚哥市立医院一个小房间的法庭上，不但审判了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政变后建立的独裁政权，而且审判了五十年来阻碍着古巴民族的政治发展的整个殖民地政权。这位二十六岁的青年革命家，从被告变成了批驳不倒的原告，他控诉了古巴的和人民的敌人，揭露了使祖国奄奄一息的各种罪恶和创伤。

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仅揭发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种种暴行、腐败和叛国行为，并以感人的言词综述了臭名远扬的普拉特修正案通过以来沉重地笼罩在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严重危机，同时，他还十分精确地规定了一整个革命阶段的纲领的基本路线：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住宅政策，民族独立的政策，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结一致，把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工业化，等等。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自我辩护詞中，真实地反映了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的意义。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六日的事件，不是一次旨在推翻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专制政府的冒险行动，而是革命的第一个澎湃的浪濤，这一革命将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生活开创一个新的解放的时代。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光辉地说明：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勇士們，原来打算夺取古巴島最东端的那个兵营，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便发动全国各阶层的爱国人民来反对亲帝国主义的暴政。这是非常正确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在軍事上虽然失败了，但从古巴革命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方面來說則是一个胜利。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向广大的城乡人民群众展示了武装斗争的客观可能性；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和七月二十六日革命运动的誕生，在把各个傳統党派排除出政治舞台方面走了第一步。这些傳統党派由于屈从美国国务院，由于迷信所謂地理宿命論和为特权阶级效劳，完全没有能力对古巴和古巴人民的问题求得正确的、革命的解决。只有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那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們由于具有真正的革命思想而团结一致，准备忍受最大的牺牲，来爭取实现国家结构的經濟、政治和社会的必要改革。

这就是被告以辩护律师身分所作的这个不平常的辩护詞中所包含的主要政治教訓。同时，《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有着偉大的道义内容。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我国

人民精华的化身，以令人难忘的雄辯口才在屠杀人民的劊子手面前表达了他对古巴民族的創造力的火热的信念。他歌颂了人民举行起义来打破不正义的枷鎖的神圣权利。他的辯护詞通篇閃耀着义务感、責任感、爱国主义以及爱自由、爱正义、爱人类尊严的无比光輝。这是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年輕一代进行勇敢和英雄主义教育的多么輝煌的一課！这是对人民反抗压迫的能力的多么大的信任！对古巴民族举行起义的前途又是一种多么大的信心！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只有那些在任何斗争环境里都保持对人民白璧无瑕的赤誠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情。“我們出生在我們的先輩傳給我們的自由国家里。我們不会同意作任何人的奴隶，除非我們的国土沉入海底。”

现在，美帝国主义威胁着要对古巴革命进行直接的侵犯。在这样的時候，这些話表达了信心，表达了全国絕大多数人民一致的願望。

革命胜利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印行过好几次。今年是“教育年”，国家印刷局决定大量出版这一历史文献。在我国光荣的历史上这一决定性的时刻，我国千千万万城乡人民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将能够在这个文献中吸取融合了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尊严的教育。

諸位法官先生：

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律师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被告遭到过这么多的严重的非法待遇。在本

案中，律師和被告是同一个人。作為律師，他甚至連起訴書都不能看到；作為被告，他被關閉在與外界完全隔絕、毫無聯繫的孤零零的牢房里，迄今已有七十六天，這是違反一切人道的和法律的規定的。

講話人從心眼里厭惡幼稚的自負，沒有心情、而且生性也不善于夸夸其談和作什麼聳人聽聞的事情。我不得不在這個法庭上進行自我辯護，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因為實際上完全剝奪了我的受辯權；第二，因為只有感受至深的人，眼見祖國受到那樣深重的災難、正義遭到那樣踐踏的人，才能在这样的場合講出嘔心瀝血、凝結着真理的話來。

并非沒有慷慨的朋友願意為我作辯護。哈瓦那律師公會為此給我指定了一位有才幹有勇氣的律師，豪爾赫·帕格列里博士，他是本城律師公會的主席。但是卻有人不容許他執行他的使命。他每次想來探望我，都被拒于監獄門外。只是經過一個半月之後，由於法庭的干預，才允許他當着軍事情報局的一個軍曹的面和我會見十分鐘。按常理說，一個律師是應該和他的當事人單獨交談的，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的權利，除非是一個古巴戰俘落到了鐵石心腸的專制當局手中，他們是不講什麼法理人情的。帕格列里博士和我都不能容忍對我們的辯護策略進行這種卑污的刺探。難道他們想預先知道我們用什麼方法粉碎他們就蒙卡達兵營事件捏造的彌天大謊，用什麼方法把他們企圖竭力掩蓋的可怕真相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嗎？於是，當時我們就決定由我運用我的律師資格，自作辯護。

軍事情報局的軍曹聽到了這個決定，報告了他的上級，這引起了異常的恐懼，就好像是哪個調皮搗蛋的妖怪捉弄他們，對他們來說，由於我的過錯，他們的一切計劃都要破產了。法官先生們，他

們为了剥夺我享有这一个在古巴有着悠久傳統的权利施加了多少压力，你們是最清楚不过了。法庭不能向这种企图让步，因为这等于陷被告于毫无保障的境地。被告現在行使这项权利，沒有任何理由对該說的东西緘口不言。我认为首先有必要說明对我实行野蛮的隔离的理由是什么，不让我讲话的意图是什么；为什么，如法庭所知，要阴谋杀害我；有哪些严重的事件他們不想让人民知道，在本案中发生的一切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奥妙何在。这就是我准备清楚地表白的一切。

二

你們曾經把这次审判称为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审判。如果你們当真这样想，你們就不該容許別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嘲弄你們、玷污你們的职权。第一次开庭是在九月二十一日。那天在被告席上坐了一百多人，四周是上百挺机枪和刺刀——这些东西可耻地闖进了法庭。絕大部分被告都与事件无关，他們在镇压机关的地牢里受尽各种凌辱和虐待之后，又被拘押了好多天。剩下的那一小部分被告雄糾糾地挺立着，准备自豪地承认他們参加了爭取自由的战斗，作出史无前例的自我牺牲的榜样，而把那些在本案中被恶意陷害的人，从监狱的虎口里解救出来。曾經交战过的人們，又一次面对面了。正义仍旧在我們一边，一場真理对謊言的激烈战斗即将展开。可以肯定，現政权沒有預想到它在道义上的崩潰就在眼前！

……怎么能够維持得住所有这些誣告呢？既然有这么多的青年准备冒一切危險——監禁、酷刑，如果必要的話，死亡——在法

庭面前揭露事实真相，那末又怎么能够阻止得了人們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呢？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受到訊問，审問了我两个小时。我回答了檢察官先生和二十位辯护律師的問題。我以准确的数字和无法辯駁的資料证实我們一共花掉多少錢，这些錢是怎样得来的，我們收集到哪些武器。没有什么需要隱瞞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以我們共和国的战斗史上前所未有的牺牲获得的。^①我談到了鼓舞我們斗争的目的和我們对待敌人一貫坚持的人道和寬大的作風。如果

① “普里奥或任何人都沒有給过我們錢，我們的經費是靠我們全体同志共同筹措和节衣縮食得来的，靠了一些追隨我的万死不辞的人們的慷慨捐贈。我保存着一份清單，開列有他們每个人的名字以及他們捐款的數目，他們几乎全都牺牲了，然而我保有一些有据可查的材料，证明正是他們捐贈了这笔为数达一万六千四百八十比索的巨款，这笔款已經全数开銷，分文不剩。为了筹集这笔款項，他們往往放棄了最基本的需要，例如节省下吃飯和電費的开銷，有人甚至卖掉或典押了自己使用的劳动工具。”

——“根据你的話，可以知道你的同志們是十分貧寒的，你是否能更詳細地說明，在这种情况下，这笔錢是怎么筹措起来的？”

——“在我們仍然活着和已被害的人当中，捐款的人如下：目前出庭受审的赫苏斯·蒙塔内捐贈四千比索，这是他受雇的通用汽車公司結束在古巴的业务时发給他的遣散費；奥斯卡·阿耳卡德（他也出庭受审了）抵押了他的實驗室，得了三千六百比索，另外他頂出了他的一个會計事務所，以所得款項作了另一笔捐獻；雷納托·吉塔特（已遇害）捐獻一千比索；埃爾內斯托·蒂索尔把他的一个养鸡場捐獻給我們的运动使用；佩德羅·馬雷罗卖掉了他家中的全套餐厅用具、电冰箱和全套客厅用具，他没有卖成他的全套臥室用具，只是由于我的劝阻，此外还因为他向一个吝啬鬼要价二百比索而未能成交……切納尔德捐獻一千比索；埃耳皮迪奧·索薩把他的工作职位轉賣給了別人，这是在一家大公司里的會計职位；何塞·路易斯·塔森德作了类似的牺牲，他是最克己牺牲的同志之一；阿維耳·圣塔馬里亞典押了他的汽車，然而这不是他唯一的貢獻，他的貢獻还要大得多，他献出了他的生命，这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刻是无价之宝；这个名單还可以繼續念下去，然而我觉得，只要法庭願意，最好还是整理好以后以書面形式交給法庭，附在預审的材料中，以調查这一切是否眞实。”（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一日首次出庭时的預审笔录）

說我能够完成我的任务，证实了所有被无辜地牽連在本案中的被告沒有直接或間接参加过活动的話，我认为这是因为我的英勇的同伴們众口一詞地支持我的說法。我說过，他們絕不会由于要对事件承担后果，而对革命者和爱国者的身分感到羞愧和后悔。在監獄里，不准許我同他們交談，然而我們想作的却完完全全一样。这是因为，当人們的心中怀着同一的理想时，不管是監獄的牆壁还是墓地的泥土，什么都不能把他們隔絕开来；因为同一的怀念，同一的心灵，同一的思想，同一的良知，同一的自尊心，激励着他們所有的人。

从那时起，政府就那些事件所搭起的无耻謊言的樓閣，就开始像紙扎的房子一样地倒塌了。結果，檢察官先生也意識到把所有被指控为煽动者的人都关在監獄里是多么荒唐，他立即要求暫時釋放他們。

我在第一次开庭中結束了我的供詞后，曾請求法庭允許我离开被告席，而坐在辯护律師席上。在这一点上，我的确获得了許可。于是，就开始了我在这次审判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使命：彻底粉碎攻击我們的战士們的怯懦、阴險、卑鄙、无耻的誣蔑，不可爭辯地揭露对俘虏犯下的可怖可恶的罪行，让全民族和全世界都看到我国人民的无穷灾难，他們正在遭受着他們全部历史上最凶恶、最惨无人道的压迫。

第二次开庭是在九月二十二日，星期二。提出证詞的才不过十个人，就已經使在曼薩尼罗地区犯下的謀杀罪行揭露无遺了，特别是明确了那个地区軍事駐营地长官的直接責任并且記錄在案。还有三百人未曾作证呢。如果根据汇集起来的大批材料和证据在法庭上审問那些要对謀杀事件負責的軍人們本人的話，結果会怎

样呢？政府能够允許我在旁听审判的大批公众面前，当着来自全島各地的新聞記者和律師，以及反对党的領袖們——这些人被愚蠢地放在被告席上，結果他們就近把这里談論的一切都能听得一清二楚——这样作嗎？他們宁可把法院連同所有的法官炸得粉碎也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①

他們陰謀阻撓我出席审判，并且为此使用了軍事手段。九月二十五日星期五的晚間，第三次开庭的前夕，两位刑事法医来到了我的牢房。看得出来他們都很忧悒。“我們来給你作一次檢查”，——他們对我說。“是誰这么关心我的健康呢？”——我問他們。实际上，我一看到他們，就已明白来意。他們总算很够朋友了，对我讲了实話：那天下午監獄里来了一个查維亞諾上校，他对他們說，我“在审判中对政府极其不利”，并且吩咐他們签署一份证书，說我有病，不能繼續出庭。医生們对我表示，他們准备辞掉自己的职务，去承受迫害，而把問題交給我自已处理。我不忍心要他們輕易地作这种牺牲，但是我也决不容許那种企图得逞。为了把这件事交給他們自己的良知去判断，我仅仅答复他們說：“你們知道什么是你們的責任；我对自己的責任也很了解。”

之后他們就离去了，并且签署了证书。我知道，他們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他們好心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我看来危險万分的性命。关于那次談話，我并不會承担保守秘密的义务；我只是对事实負責。如果在这里讲出来損害了那两位善良的自由职业者的

① 人民社会党机关报《今日报》在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发生后数小时被查封。在攻打兵营事件的审判中，出庭受审的被告除菲德尔·卡斯特罗和鎮压后的其他幸存者外，尚有人民社会党领导人华金·奥尔多基·梅薩和拉薩罗·培尼亚，以及一些資產階級政党的领导人，如米略·奥乔亚、阿伊达·佩拉約、路易斯·卡塞罗、阿图罗·特利亚埃切等人。

物质利益，他們的荣誉却被洗刷清白了——而这一点要有价值得多。当天晚上我就給本法庭写了一封信，揭露策划中的阴谋，要求派两位法医来鉴定我的良好的健康状况，我还向你們說明，如果为了挽救我的性命就得容忍这种伎俩的話，那末我是千百倍地宁愿牺牲性命的。为了表明我决心要单枪匹马对所有这些下流的勾当展开斗争，我在信中还加上了导师馬蒂的下面这一思想：“一项正义的事业，起自山洞的洞底，可以胜过千軍万馬。”这封信，正如本庭所知道的，就是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博士在九月二十六日第三次开庭时所提出的信件。尽管对我进行了严密的监视，我还是把信送到了她的手中。不用說，由于这封信，立即采取了报复措施：埃尔南德斯博士被隔离，而对我呢，由于我本来就已经被隔离，就把我迁到监狱中最偏僻的角落。从那时起，所有的被告在出庭以前都要从头到脚仔细地搜查一遍。①

二十七日来了两位法医，他們证实了我的健康状况确实良好。然而这以后，不管法院怎样一再下令，我却再也没有被帶到法庭上来过。还不止于此，有一些身分不明的人天天散发上百份伪造的小册子，胡說什么要把我从獄中劫出去，这是一种笨拙的贼喊

- ① 梅尔瓦·埃尔南德斯律师在她的头发中夹带了一个紙卷，当众交給法官，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这張字条中向法庭控告对他施行的阴谋。这張字条的全文如下：

“致紧急法庭：

“菲德尔·卡斯特罗·魯斯，律师，在本年第三十七号案件中出庭自我辯护，謹說明如下情况：

“1. 有人企图阻撓我出庭，因为我如果出庭，就会揭穿就七月二十六日的英雄业绩捏造的种种荒謬謊言，那一天对俘虏們的恐怖罪行不免会全部暴露，——我声明，这些罪行是古巴历史上最駭人听闻的屠杀——因此，今天我接到通知說，由于我患病，我将不必出庭，而实际情况是，我的健康情况絕对良好，未患任何疾病。这是一种最无耻地欺騙法庭的企图。”

捉賊的把戲，目的是借口越獄而從肉體上消滅我。這一企圖由於有高度警惕的朋友們及時揭露而未能得逞，同時醫師證書的虛偽性也被揭破，他們要想阻撓我出庭就只有公開無耻地和法庭對抗了。

諸位法官先生，這裡所發生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一個政府害怕將一個被告帶到法庭上來；一個恐怖和血腥的政權懼怕一個無力自衛、手無寸鐵、遭到隔離和誣蔑的人的道義信念。這樣，在剝奪了我的一切之後，又剝奪了我作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權利。請注意，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停止一切保證、嚴格地執行公共秩序法^①以及對廣播、報刊進行檢查的時候。現政權該是犯下了何等駭人的罪行，才會這樣懼怕一個被告的聲音啊！

我應該強調指出那些軍事首腦們一向對你們所持的傲慢不遜的態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於我的非人的隔離，一再下令尊重我的最起碼的權利，一再要求將我交付審判，然而無人遵從，所有這些命令一個一個地都遭到抗拒。更惡劣的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開庭時，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衛隊防綫，阻止我同任何人講話——那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時候，這表明他們不僅在監獄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們各位面前，也絲毫不理會你們的規定。當時，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時把它作為一個法院的起碼的榮譽問題提出來，但是，……我再也沒有機會出庭了。他們作出了那些傲慢不遜的事之後，終於把我們帶到這裡來，為的是要你們以法律的名義——而恰恰是他們，也僅僅是他們從三月十日以來一直在踐踏法律——把我們送進監獄，他們要強加給你們的

^① 公共秩序法，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政變後不久頒布，該法取消公民的民主權利，實行審查制度，為政府武裝部隊的恐怖鎮壓活動奠定法律基礎。

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願武器順从袍服”这句拉丁諺語在这里一次也沒有实现过。我要求你們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但是，所有这些手段到头来都是完全徒劳的，因为我的勇敢的伙伴们以空前的爱国精神，出色地履行了他們的职责。

“不錯，我們是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們决不为此而反悔。”当他们挨个被傳去訊問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說，并且跟着就以令人感动的勇气向法庭揭露在我們的弟兄們的身上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虽然我不在場，但是由于博尼亚托監獄的难友們的帮助，我能够足不出牢房而了解审判的全部詳情，难友們不顾任何严厉惩罚的威胁，运用各种机智的方法将剪报和各种情报傳到我的手中。他們就这样地报复監獄长塔沃亚达和副監獄官罗薩瓦尔的胡作非为，这两个人讓他們一天到晚地劳动，修建私人別墅，貪污他們的生活費，讓他們挨餓。

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顛倒了过来；原告結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作巴蒂斯塔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他的凶殘的走狗們会遭到人民的判決的話，那末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現在受到判決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們被送往皮諾斯島，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①的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縈繞在人們耳中。他們被帶到那里，离乡背井，被放逐到祖国之外，隔絕在社会之外，在苦獄中磨灭他們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們不认为，正像我所說的，这样的情况对本律师履行他的使命

① 菲德尔·卡斯特罗这里是指佩德罗·阿伯拉罕·卡斯特尔斯—巴雷拉，他是陸軍上校，在馬查多时代任皮諾斯島模范監獄監獄长。一九三三年馬查多倒台时，被控負有杀害五百名政治犯的責任，因而被枪毙。

來說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嗎？

經過這些卑污和非法的陰謀以後，根據發號施令者的意志，也由於審判者的軟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醫院這個小房間里，在這裡悄悄地對我進行審判，讓別人聽不到我的講話，壓住我的聲音，使任何人都無法知道我將要說的話。那末，莊嚴的司法大廈又作什麼用呢？毫無疑問，法官先生們在那裡要感到舒適得多。我提醒你們注意一點：在這樣一個由帶着鋒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圍着的醫院里設立法庭是不合適的，因為人民可能認為我們的司法制度病了……被監禁了……

我請你們回憶一下，你們的訴訟法規定，審判應當“公開進行，允許旁聽”^①；然而這次開庭卻絕對不許人民出庭旁聽。只有兩名律師和六名記者獲准出庭，而新聞檢查却不許記者在報紙上發表片言只語。我看到，在這個房間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聽眾是百來名士兵和軍官。這樣親切地認真關懷我，太叫我感謝了！但願整個軍隊都到我面前來！我知道，總有那么一天，他們會急切地希望洗淨一小撮沒有靈魂的人為實現自己的野心而在他們的軍服上濺上的恥辱和血的可怕的污點。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遙自在地騎在高尙的士兵背上的人們可够瞧的了！……當然這是假定人民沒有早就把他們打倒的話。

最後，我應該說，我在獄中不能拿到任何論述刑法的著作。我手頭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這是一位律師——為我的同志們辯護的英勇的包迪利奧·卡斯特利亞諾斯博士剛剛借給我的。同樣，他們也禁止馬蒂的著作到我手中；看來，監獄的檢查當局也許認為

① 古巴刑事訴訟法第四條。